

综 述

我国历代本草研究整理的
近况与展望(续)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谢宗万

三、对古代保存下来的药材标本进行实物鉴定

中国药物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盛放日本圣武天皇遗物的官库)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一些药材实物标本^(186,186)。日本学术界对其相当重视,曾于1948~1950年间,组织了以朝比奈泰彦为首包括各科专家在内的调查团,其中有药学家10人,他们着眼于阐明药物的实体,并与现时同名药物比较其异同。他们不但从事了组织学的研究,而且还研究了千余年来由于药物贮藏所发生的化学成分的变化,并鉴定出60种药物的拉丁学名,这对研究唐《新修本草》的有关药物品种,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日本的这一研究成果,已汇集在《正仓院药物》⁽¹⁸⁶⁾一书中,1955年由日本植物文献刊行会发行。刘米达夫在1956年3月的《日本药学杂志》上撰文推荐这批古代文物是“稀世之珍”。

众所周知,我国于七十年代由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除了保存完好的女尸以及彩绘帛画、纺织品、漆器等甚为丰富的文物以外,还有反映西汉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状况的大量农产品、药物、动物等。其中药物经南京药学院等单位共同协作进行鉴定,写出药物鉴定报告⁽¹⁸⁷⁾。鉴定报告表明一号汉墓中有药物茅香、高良姜、桂皮、花椒、辛夷、藁本、姜、杜衡和佩兰9种,并附有药材外形及组织彩色照片。此等药物均有芳香辟秽之用,已保存两千多年,可视为研究我国汉代医药学史的部分重要实物依据。这一珍贵史料,已由国家摄制成科学电影片,在国内外放映,普遍得到好评。

出土古药物,除了马王堆一号汉墓外,尚有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桃仁、郁李等;山东巨野县西汉墓出土的药丸(主要是矿物药成分);新疆出土的唐代丸药萎蕤丸;西安南郊出土窖藏的唐代金石药石英、云母、金屑、钟乳、丹砂以及动物药珊瑚等;福建泉州从宋代古沉船中获得的沉香、胡椒、龙涎香、朱砂、水银、玳瑁、降真香等以及云南大理出土的琥珀、珍

珠等药物。上述出土或出水的药物都是研究古代药材品种的最好实物见证。

六十年代我国故宫博物院内也还保存着一部分清代使用的药物,笔者曾亲见其所保存的中药威灵仙,不是毛茛科铁线莲属威灵仙,而是百合科植物短梗菝葜(黑刺菝葜) *Smilax scobinicaulis* C. H. Wright,与现时华北地区使用的铁丝威灵仙相当,从而也了解到铁丝威灵仙的部分药用历史。现在故宫还存有部分古代药材,建议由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卫生主管部门共同协作,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相信此项工作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

四、古文献中中药生产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中药生产知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代本草及有关文献对前人经验的文字记载;一是掌握在中药师傅和药农手里的实际宝贵经验。把实际经验与书本知识的继承和总结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比较深入地掌握中药传统的生产知识。这里只是从文献整理方面介绍一些情况。

(一) 中药栽培:我国引种中药始于何时?很难实考。1965年盛诚桂⁽¹⁸⁸⁾推断大概在公元以前。因在秦汉两代,中药的引种栽培事业已开始发展。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2年前后),引入了葡萄、苜蓿、安石榴、胡桃、胡麻、大蒜、胡荽、红花等植物和中药(宋向元⁽¹⁸⁹⁾早在1957年曾对张骞出使西域与药物输入提出看法)。据隋书百官志及旧唐书职官志记载,远自公元五世纪起,隋唐两个朝代都设置有“药园师”专职,专门掌管中药的栽培和采收,在隋书经籍志里面还记载了“种植药法”。公元六世纪三十年代,在贾思勰著的《齐民要术》中曾提到了麻(大麻)、胡麻、蒜、芥子、胡荽、兰香、荏、姜、藜蘆、枣、桃、李、梅、杏、梨、柿、安石榴、木瓜、椒、茱萸、桑、竹、红蓝(红花)、梔子、紫草、芡(菱)、芡、莲等多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法。

到了宋代,中药栽培又有了发展,在苏颂的本草

著作里,就提到了马蔺、车前、射干、红花、肉豆蔻、藿香、香薷、黄精、罂粟、续随子、牵牛子、胡芦巴、附子、通脱木、贝母、石南、南烛、五加、紫荆、桃榔、胡桃、旋覆花和苘麻等二十余种中药的栽培法。在宋代的其他著作里,提到药用植物栽培法的还有牡丹、各种橘类、龙眼、枇杷、当归、薄荷、辛夷、姜黄等。

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对中药栽培部分除引用前人的文献外,又加上他自己实地记载的栽培种类,这些种类有商陆、菊花、三七、草石蚕、麦门冬、天门冬、延胡索、黄芪、郁金、牛膝、玉簪、牛蒡子、曼陀罗、芍药(川芍)、蒺藜、玉竹、虎耳草、苍术、白术等⁽¹⁸⁸⁾。

刘寿山⁽¹⁴⁰⁾将《本草纲目》各药有关栽培经验部分,分别归纳于土壤、整地、播种、灌溉、施肥、收获、防虫等项目之中,使人一目了然。刘氏还称颂李时珍更注意到栽培中药的经济价值,他在薯蓣(山药)集解项下谓“近汴洛人种之,极有息”。这说明现代称之为四大怀药之一的“山药”,早为河南人种植,而且栽培良好,受人欢迎,药农受惠不小,这就间接地联系到地道药材的重要位置上来了。

(二) 中药炮制: 炮制是中药特点之一。关于炮制文献的整理,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探讨雷教传略及《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例如赵燏黄⁽¹⁴¹⁾、宋大仁⁽¹⁴²⁾、冉小峰、尚志钧⁽¹⁴³⁾等均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大都认为雷公和雷教根本是两个人,相距有两千多年,《雷公药对》的著者是黄帝时代的雷公,而《雷公炮炙论》的著者是南北朝时的南朝刘宋人雷教。明徐春甫误雷教为雷公,《古今图书集成》又以讹传讹,遂导致传说的混乱,这一问题,现已得到澄清。二是探讨古代对炮炙的贡献和古代炮炙方法的基本内容。尚志钧曾撰文探讨《本草经集注》对于药物炮炙和配制的贡献⁽¹⁴⁴⁾,冉小峰在《中药炮炙法的讨论》⁽¹⁴⁵⁾一文中对古籍记载的炮炙十七法进行了介绍和讨论。三是总结历代炮炙经验,把历代本草中有关不同时期的炮制方法记载下来,便于系统比较以掌握其特点。1973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等单位编写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¹⁴⁶⁾,该书收集了自汉至清代(公元前200年~公元1893年)主要医药著作167部,系统地摘录了有关中药炮炙部分,可供研究参考。冯宝麟等⁽¹⁴⁷⁾认为历代中药炮制的发展概况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自春秋战国至宋代(公元前402年~公元11世纪以前)是中药炮制技术的起始和形成时期;元、明两代(公元15~16世纪)是炮制理论的形成时期;清

代(公元17~18世纪)是炮制品种扩大和炮制技术的成熟时期;并认为现代使用的炮制技术大体就是沿用明清时代的方法。此外,本文还探讨了炮制理论、技术及应用等方面的发展,是目前论述中药炮制发展情况比较全面的文章。

(三) 中药制剂: 从古代文献上系统整理古代中药制剂技术的文章往往散见于有关杂志之中,如冉小峰曾发表过“论华佗中藏经的药剂技术”⁽¹⁴⁸⁾、“论伤寒论的药剂技术”⁽¹⁴⁹⁾、“中药丸剂的起源和发展”⁽¹⁵⁰⁾;胡长鸿论述过“张仲景在药剂学上的贡献”⁽¹⁵¹⁾以及“从本草纲目看我国古代在药剂学上的成就”⁽¹⁵²⁾;朱晟探讨过“汤药剂型的历史”⁽¹⁵³⁾;甄汉臣作过“古今药酒制法的介绍”⁽¹⁵⁴⁾等等。学习以上文献可对明代以前的药剂发展情况,有一个轮廓性的了解;关于丸、散、膏、丹、药酒等传统剂型的发展历史,张炳鑫⁽¹⁵⁵⁾曾发表专文综合论述,认为各种中药剂型在宋朝时就已基本齐备了。例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载691个方剂,已经具体的记载了这些剂型的特点、性质和制法,是一部研究古代中药制剂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一宋元流行最广的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汪良寄⁽¹⁵⁶⁾曾专门撰文予以评介。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煮散、膏剂的发展和工艺、栓剂、紫雪丹等的历史和特点也都作有相应的文献研究。

我们说总结传统经验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在于发扬和提高。但由于古人对药物生产知识的认识,受到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条件的限制,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实出发,用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和整理。例如在总结药材栽培技术经验方面,就要总结栽培地道药材的特殊技术和宝贵经验,及研究地道药材的质量与植物地理学的关系,从而肯定这些药材是在各地广泛引种栽培好,还是在原产地扩大种植或自然护育更为有利?中药材的栽培,必须要充分考虑发挥优势、因地制宜的问题。在中药炮制方面,过去有“遵古炮炙”的说法,我看并不妥当,古法不尽相同,不能一味厚古薄今,应该试验比较,择善而从,不能停滞不前。中药炮制要探讨药物在炮制前后的成分和性能变化,以便改进操作方法和制定工艺规程。在中药剂型方面,一定不要满足于现状,要在符合中医用药特点和保证或提高疗效的前提下研究剂型改革问题,至于生产上进一步的自动化和半自动化的问题,可视当时的需要与条件而决定。

五、中药药性与效能的总结及现代本草的编写

中药是祖国医学学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四气五味、升降浮沉、药物

归经等中药理论,很多文献都加以讨论。然而,同一药物的药性,诸家本草记载不一,甚至有不少矛盾,归经也不尽同。这对进一步的指导临床用药和继承学习,都会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目前除运用现代药理学及其他有关现代先进科学方法来阐明中药的药性外,结合中医临床实践,从总结效能中来研究中药,已愈益受到中医药科研人员的重视。

由于医学的不断进展,历代本草对药物效能的认识亦会有所不同。把前人从临床实践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加以系统总结,深入分析,对临床医疗就能起到提高和进一步指导的作用。例如王少华^[167]系统总结了苍术和白术的功能,并指出其在临证应用上的异同,对临证应用具有指导作用。枳实在《神农本草经》中也用于益气^[168],后世医家主要用作破气^[169]行痰、散积消痞药。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单位证明临床应用枳实注射液有升压、抗休克^[169~168]作用,目前枳实水煎剂已被广泛用于治疗胃下垂和气虚下陷的子宫脱垂、脱肛等症,化学与药理^[164]研究结果显然支持了古人关于枳实益气的说法。

在总结单味中药效能方面,要重视研究前人的医方和现时有效的民间验方。例如李蔚普^[165]就从本草文献和普济方、和剂局方中发掘了治疗痢疾的金石药;陆闻鸿^[166]从方剂中研究了半夏的效用;任应秋^[167]从历代有关治疟的医方中总结常山治疟的功效;徐州医学院研究了中药麻醉发展简史^[168],从古代有关麻醉方剂中卓有成效地研究出新的中药麻醉方剂等。这种总结方法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借鉴和吸取前人和现时药治的宝贵经验,好处是切实可行,少走弯路,而且能够做出较好的成绩。

从医方中总结单味药的效能也还有一一些问题存在,例如桔梗在《伤寒》、《金匱》方中多用于排脓,而现时有人用桔梗于肺脓疡病人则往往效果不明显,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

对于本草书籍从疗效方面加以整理研究的,在台湾,张贤哲著有《本草备要新疏义》,庄兆祥对肖步丹的《岭南采药录》进行了增订。关于动物类中药在历代本草中的应用情况,林乾良^[169]对此曾专门作过简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中医药极为重视,党的中医政策促进了祖国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对本地地区的药物资源进行了普查,对许多流传在群众中的有效方药也不断陆续发掘出来,并编辑成册,供交流推广。对一些重要中草药进行了化学成分分析、药理实验及抑菌

试验等,为系统研究中药和发展新用途创造了条件。从现有文献记载的中草药种数看来就在5000种以上,比《本草纲目》所记载的1892种超过很多,而且应用药物的经验与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在充分总结前人药物生产(包括地道药材的栽培、采集、辨认、炮制……)和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一部既有继承,又有发扬,既能集中历代本草的精华所在,而又能反映当前时代特点和水平的现代本草书籍,看来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近几年来《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草药学》和《中药志》(修订本)等大型中草药书籍先后不断出版,但各有其独特之处,毕竟和“现代本草”在内容要求和编写体例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还不能完全取代。为此,我们认为在今后适当时机组织全国有关方面力量,通力协作从事此项工作,意义仍然十分重大。

× × × ×

综上所述,历代本草是祖国医药学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由于它是现代中药学的前身,所以它和现时的中药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药研究离不开历代本草,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历代本草的研究和整理除了纯文史性质的一部分工作以外,很需要紧密联系现时的中药生产和临床实际,否则就是目的不明,因而也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研究整理历代本草的目的,不是专门为了评介,而是重在吸取其精华,为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和文化遗产而努力;具体说来,就是系统地总结前人的经验和药物的发展规律,使之发挥它对药物生产和临床用药的指导作用,使它充分地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总起来一句话,就是“古为今用”。

鉴于历代本草内容丰富,研究、整理这一宝贵遗产是一项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任务。要很好的完成这个光荣的历史使命,就非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进行不可。特别在当前后继乏人的情况下,若任其自流,不采取有力措施,就不免会有中断之虞。至于在步骤上则可以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重点而后一般。在途径方法上,可以多种多样,依据本单位和自身的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既可以采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文史学的方法,又可以采用结合临床调查总结和实验研究的方法;有的可以运用最新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探讨中药药性理论,有的也可沿用传统方法加以总结。从进行工作的人员方面来说,中医中药工作者(包括西医西药人员学习过中医、中药的)可以做,文史工作者可以做,

生物工作者也可以做;出版部门除了出版界有关研究整理的成果之外,亦应继续主选有价值的善本本草或药图进行注释、校勘和影印,而且还可以组织编写一些通俗的小册子,做好普及推广工作。只有紧密的结合各自的专业和特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展望未来,研究整理历代本草的工作,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果。

(续完)

参考文献

- (135) 朝比奈泰彦等:正仓院药物,日本植物文献刊行会,1955。(136) 朱晟:中药通报2(3):194,1956。(137) 南京药学院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138) 盛诚桂:植物引种驯化集刊,第一集,66页,科学出版社,1965。(139) 宋向元:新中医药8(7):30,1957。(140) 刘寿山:药学通报3(8):356,1955。(141) 赵炳炎:上海中医药(1):31,1957。(142) 宋大仁等:浙江中医杂志(8):31,1957;(9):39,1957。(143) 尚志钧:哈尔滨中医(5):57,1961。(144) 尚志钧:哈尔滨中医(3):64,1961。(145) 冉小峰:中药通报1(2):50,1955。(146) 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等: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印,1973。(147) 冯宝麟等:中药炮制发展的研究,内部资料,中国药学会山东分会印,1980。(148) 冉小峰:上海中医药杂志(11):509,1956。(149) 冉小峰:中医杂志(10):525,1957。(150) 冉小峰:中药通报5(2):48,1959。(151) 胡长鸿:中药通报4(1):3,1958。(152) 胡长鸿:中药通报(1),2(3):90,1956;(II),2(4):141,1956;(III),2(6):222,1956;(IV),3(1):13,1957。(153) 朱晟: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3):174,1957。(154) 甄汉臣:江西中医(4):43,1956。(155) 张炳鑫:中药通报2(2):50,1956。(156) 汪良寄:中华医史杂志(2):83,1953。(157) 王少华:江苏中医(11):13,1962。(158) 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67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59) 成都中医学院主编:中药学,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60) 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科教研组:科学通报(1):58,1978。(161) 湖南医药工业研究所四室等:中草药通讯(5):6,1976。(162) 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教研组:中草药通讯(10):34,1977。(163) 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内科教研组:中草药通讯(4):38,1974。(164) 陈修等:药学报15(2):71,1980。(165) 李蔚普:江西中医药(11):54,1953。(166) 陆闻鸿:中医杂志(3):15,1955。(167) 任应秋:江西中医药(3):31,1954。(168) 徐州医学院中麻组张方庆等,中麻通讯(3):68,1975。(169) 林乾良等:中草药通讯(4):42,1978。

犀角地黄汤加减治疗带状疱疹1例

唐山钢铁公司医院中医科 王翠屏

刘××,女性,54岁,退休工人。右侧面部红肿、出现疱疹、灼痛已1周。

1980年3月8日患者自觉舌右侧疼痛,并出现针尖状小白点,次日疼痛难忍,右侧面部出现许多小白点,逐渐形成小水疱,同时伴红肿,右侧舌面及口唇溃烂。第3天症状逐渐加重,恶心呕吐,吐出少量胃内容物,张口困难,听力下降。4天来心烦不眠,不能进食,大便7天未解。于3月14日来我院就诊,收入五官科病房。当天输葡萄糖液1000毫升,红霉素1克,杜冷丁日2次肌注,每次50毫克,口服安乃近。但仍疼痛难忍,上症不减。3月15日邀中医会诊。

检查:体温37.8℃,右侧面颊及耳前后,延至发际,出现成群带状疱疹,界限清晰,局部红肿灼热,触之痛甚。疱疹内容微混浊,右半舌及口唇已溃烂,附着脓性分泌物,颌下淋巴结肿大。白细胞5400/立方毫米,中性64%,淋巴36%。尿液检查:蛋白微量,白细胞+,红细胞++。脉弦数,舌质红绛,左侧舌苔黄厚。诊断为蛇丹(带状疱疹)。证属内热炽盛,化火

化毒。治以清热解毒凉血。处方:

广牛角10克,生地30克,丹皮12克,白芍12克,板蓝根30克,银花30克,连翘18克,桔梗10克,牛蒡子10克,紫草10克,大黄10克,甘草10克。水煎服,3剂。

病人于服药后的当天晚上进粥1碗,疼痛减轻,安睡一夜。第2天大便1次,疱疹吸收好转,疼痛大减。服药3剂后疱疹完全吸收,红肿消失,舌唇溃烂处已结痂,化验尿常规正常。3月18日痊愈出院。病人出院后,随访2次,无任何不适。

体会:带状疱疹中医称为“缠腰火丹”、“蛇丹”等,多因肝胆火盛,内蕴湿热而发,治则应清利肝胆之热,多用龙胆泻肝汤加减。比例疱疹发于头面部,属足阳明胃经循行部位,因胃火炽盛,火毒外迫而发疹。症见恶心呕吐,不能进食,大便燥结,舌苔黄厚而燥,亦说明胃火炽盛;加以心烦不眠,舌质红绛,尿中红细胞++,说明热邪迫入营血。故采用清热解毒、凉血散瘀的犀角地黄汤加减,而收到速效。